

中国地方史志丛书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丛书之十七

中国地方志总论

地方史志研究组编



中国地方史志协会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中国地方志总论

地方史志研究组编

中国地方史志协会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1981年·长春

封面设计 韩在贤

业经吉林省出版局吉业印字第〇四六号文批准

编辑者：中国地方史志协会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出版者：吉林省图书馆
印刷者：吉林省工业印刷厂
出版日期：一九八一年十月
地址：长春市吉林省图书馆
研究辅导部
电话：53802

前 言

《中国地方志论丛》是为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和情报资料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大专院校的有关专业师生提供的教学参考书。

地方志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我国各地区的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经济、工业、农业、交通、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情况的重要资料宝库。它持续不断地记录了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各地区各时代阶级关系、生产关系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和所取得的成就。从地方志中也可以了解天文、气候、地形、地质、水利、地理沿革、自然资源、动植物的变化及飞禽走兽、鱼类的迁移等情况，地方志有其鲜明的区域性、连续性、广泛性和可靠性。

为了配合全国地方史志的研究工作，配合全国各省、市、县以及人民公社地方志的编写、各地的普查地名工作以及编写各地乡土教材，发展文物旅游事业，为了向各系统、各级、各类型图书馆、资料室、博物馆、考古队、情报室、档案馆、文化馆以及党、政、军、群众团体等行政部门提供有关我国地方志的整理、保存、利用等方面的知识，使地方志更好地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服务，我们这个地方史志研究小组编辑了《中国地方志论丛》（上、中、下三册），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的大力支持，将这三册书列为中国地方史志丛书和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丛书之十七、十八、十九出版。

《中国地方志论丛》上册为《中国地方志总论》，中册为《中国地方志分论》，下册为《吉林省地方志考论、校释及汇辑》。本书为《中国地方志总论》，编辑了关于中国地方志的性质、特征，地方志的历史源流、文献价值和现实意义，旧方志的整理和新方志的撰写原则，中国地方志在国内外的收藏情况，地方志的目录学总结，中国地方志理论研究以及怎样利用中国地方志遗产为祖国四个现代化服务等方面的内容。这些论文大部分是从建国以来报刊上发表过的有关文章中选辑出来的，因水平所限，缺点在所难免，尚请读者指正。

在本书编辑过程中，中国地方史志协会付秘书长周雷同志给予了热情的帮助，谨表谢意。

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共八位同志。主编金恩晖；付主编曹殿举、王中明；编辑郭建文、郭铁城、张铸、张朝清、郭景宪。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 丛 书 顾 问

(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志刚	于 声	王 也	王化长	皮高品
刘 宣	李 星	李长路	李芳晨	汪长炳
佟 冬	佟曾功	宋振庭	杜 克	辛希孟
罗继祖	周文骏	张 复	张庆春	张松如
张琪玉	张德芳	张遵俭	赵 琦	胡家柱
胡耀辉	杨威理	袁咏秋	顾 民	顾廷龙
徐文绪	郭松年	黄钰生	彭斐章	程德清
鲍振西	谭祥金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金恩晖

付主编: 江乃武 曹殿举

编 委: 王中明 文甲龙 符孝佐 江乃武
金恩晖 郭建文 郭铁城 曹殿举

承蒙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主任栗又文同志百
忙中为本书题签。特向栗老致
以深深的谢意。

2015.6.1

目 录

一、中国地方志总论

中国的地方志·····	王重民 (1)
中国地方志浅说·····	朱士嘉 (11)
谈谈地方志中的几个问题·····	朱士嘉 (28)
方志——史料的宝库·····	傅振伦 (39)
中国古代史料宝库——地方志·····	邹烈勋 (43)
地方志是一座宝库·····	蒋光田 (48)
谈谈地方志·····	魏 光 (65)
地方志简介····· 武汉大学《中国图书知识》编写组	(82)
地方志是重要的历史文献·····	潘新藻 (94)
以地域为记载中心的方志·····	张舜徽 (99)
论中国元明清以来的地方志·····	傅振伦 (107)
方志源流试探·····	陆振岳 (125)
中国方志史初探·····	刘纬毅 (143)

二、中国的地方志研究及利用

应该十分重视地方志的整理研究工作·····	朱士嘉 (159)
关于加强中国地方志学研究刍议·····	金恩晖 (163)
章学诚方志理论研究·····	黄 苇 (168)
章学诚在地方志学上的贡献·····	李昭恂 (194)
章学诚的方志学·····	仓修良 (205)

方志遗产的目录学总结

一谈《中国地方志综录》、《中国古方志考》及其他

..... 胡道静 (219)

《中国地方志综录》(增订本)自序..... 朱士嘉 (226)

《中国古方志考》叙例..... 张国淦 (229)

地方志书目及地方志书目编制法

...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目录学概论》编写组 (234)

略论清刻方志的收录问题..... 刘尚恒 (242)

方志在农业科学史上的意义..... 游修龄 (249)

三、整理旧方志与编辑新方志

中国地方史研究会八省市筹备小组会议纪要

..... 郭烈勋 (264)

整理旧方志与编辑新方志问题..... 傅振伦 (268)

对编辑新方志及整理旧方志的几点意见..... 居漱庵 (277)

普修新地方志的拟议..... 金毓黻 (283)

发扬传统 编修方志..... 刘光禄 (289)

关于地方志工作的几个问题

..... 安徽省科学分院历史研究室地方志组 (294)

谈编纂新地方志的几个问题..... 张海鹏 (303)

修志刍言..... 刘永之 (309)

加强调查研究 认真编好省志..... 张秀熟 (325)

关于编修省志的项目和断限问题..... 王 驰 (336)

关于纂修上海方志新志的体例问题..... 吴贵芳 (338)

上海十县兴修新志座谈简报..... 姚全兴 (346)

关于编纂新县志的初步方案(讨论稿)..... (351)

图书馆如何在配合地方志编写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 柳成栋 (357)

中国的地方志

王重民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地方志占有很大的比重。仅现存的地方志就有7,413种（大约宋代28种，元代11种，明代860种，清代6,514种），计109,143卷。

一、地方志的发展

地方志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1）最早的全国性的区域志（公元前4世纪——公元1世纪。全国性的区域志是随着中央集权的封建政府的发展和巩固而编辑出来的，但他的依据则是来自地方上的资料，地方志是随着地方上的封建地主势力的成长而产生的，它出现于全国性区域志撰成之后。现存《禹贡》是一部最早的全国性区域志，但内容简略，只具有一个雏形。西汉末年班固撰《汉书·地理志》内容比《禹贡》充实、完备，记载了全国行政区域的划分及其贡赋、物产，才把全国性的详细的系统的区域志建立起来。它们的出现与中央集权的封建政府的形成过程密不可分。《禹贡》成书于战国时期也非偶然。当时全国进行战争，不仅要了解本国地理，而且要了解他国的地理，同时由于经济上呈现了统一的趋势，政治上大一统的趋势也在酝酿中。为了控制水利就提出打破国与国以河为界的要求。贾让《治河之策》说：“提防之作，近起战国。齐与赵魏以河为境。齐地卑

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禹贡》便反映了当时政治上、经济上的这种统一的要求。它记载了中国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交通，并且对于土壤、物产、贡赋还分成若干等级，为封建地主阶级当权派提供了地理及经济资料。但是比较详尽的全国性的区域志只能在中央集权的封建政府巩固以后才会出现。汉武帝建立了巩固的中央集权政府，为了洞悉全国经济地理以及向朝廷输运贡赋的情况，命令各地方政府记载当地物产、贡赋和交通等资料随着“计车”送给太史。这些资料为编制全国性的区域志奠定了基础。司马迁的《史记·河渠书》只记载河道，尚不能编成系统的地理志。汉成帝时，刘向开始将“域分”（行政区划和分野）略加整理。后来丞相张禹管天下财赋，搜集了较多的资料，他又命下属朱轂整理全国各地的“风俗”。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就是把《禹贡》以来的旧文传说以及近百年的有关资料加以总结而写成的第一部全国性的区域志。《汉书·地理志》记载到汉平帝时，全国已有郡、国（王国）103，县邑1314，道32，侯国241。并且对各个行政单位的沿革、山水、土特产及政府设立的盐铁官、均输官、工官、桔官等也作了简明的记载（郡国下面记户口）。《汉书·沟洫志》则记载了全国渠道堤堰等。它们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全国的地理情况和经济特点。此后，全国性的区域志随着统一的封建政权的发展而进一步发展起来，如在西晋统一的时代产生了挚虞的《畿服经》170卷，在隋代统一的时代产生了《隋区域图志》129卷和《隋诸郡土俗物产记》151卷，这些都影响着地记和图经的发展。唐宋时代产生了更多的或详或略的全国性区域

志，元、明、清三代更发展成为大部头的《一统志》，它们对于地方志影响和互相关系就更多了。

(2) 地记(公元1世纪—6世纪)。地记主要是为地方的封建势力(地方政府和豪族)服务的，它在西汉已有发展了。由于东汉以后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地方豪族的成长，地记有了显著的发展。据《隋书·经籍志》杂传类叙说：“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贤。郡国之书，由是而作。”从这个记载，说明地记是先从统治者所最重视的地区开始撰作的，其内容也是从地方人物、风俗、文化、物产逐步扩大，逐渐充实完备。此后，虽经三国较短期的分裂(公元220—265)和南北朝长期的分裂(公元317—589)，但在地方割据的局面下，地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还是逐步发展的，因此地记的撰修也就继续增多。各个重要的地区都有“风俗记”、“风土记”，边远地区则有“异物志”。同时还有专记山水的“水道记”和“山水记”等。这一时期的地记数量甚多。南齐人陆澄搜集了160家的地记编成《地理书》149卷，录一卷。梁人任昉又在陆澄《地理书》的基础上新收84家著作，编为《地记》252卷。这些著作早已散失，其佚文曾被史书征引，因而成为补充同时期全国地方志的宝贵材料，鲁迅先生在《会稽郡故旧杂记》中收录了这一时期的八种关于会稽郡的地记(其中记载地方人物的四种，地方山川风物的一种)，说明地记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清代学者在辑佚的风气中，也辑存了不少的地记，如王谟的《汉唐地理遗书钞》和陈运溶的《麓山精舍丛书》等。

(3) 图经(公元6世纪—12世纪)。最早的图经是以

图为主，用图表示该地方的土地、物产等。经是对图作的简要的文字说明。晋人常璩所撰《华阳国志》记述了公元145年巴郡太守但望根据《巴郡图经》，了解巴郡的境界、属县、属官、盐铁官和户口等，他所依据的文字当系地图的说明（即经）。这种文字说明越到后来越多，图在图经中的地位和作用因之缩小。6世纪的图经仍然有图有经，但是以经为主了。到了隋代，图经一类的地记更为普遍。大业中（605—616）“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虞世基、郎茂等从这些材料中编成了《隋诸州图经集》100卷，可见里面是包括着许多图经的。唐代图经的编辑，益臻普及，内容更完善。如从敦煌发现的《沙州都督府图经》和《西州都督府图经》两个图经残卷，可以看到唐代图经大致面貌。它们除了记载行政机关和区划外，还记叙该地的河流、堤堰、湖泊、驿道、古城、学校和歌谣等。边地图经的内容都如此完备，内地的图经自然更为详尽了。从五代至北宋初年，图经继续发展，据《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图经名目来看，其数量是很大的。北宋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成立修九域志局，令全国先修图经，现存沈津的《四明图经》的初稿，就是在这一倡导下开始纂修的。到南宋以后，图经都改称地方志。如《严州图经》在南宋绍兴间的刻本改称《新定志》，就是一个例证。图经与地方志在内容上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名称的改易而已。南宋的地方志基本上保存了图经的资料。从地记过渡到图经，在内容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图经比地记的内容要完备得多，再从图经过渡到地方志，其内容基本相同，这是由于地方志发展到这样完备的时期，图经的名称已不适用了。

(4) 地方志(公元12世纪—20世纪)。地方志是由地记、图经逐步发展而成的。到南宋以后,地方志与全国性区域志的关系愈密切,互相影响也愈多。元、明两代都有《一统志》。清代《一统志》经康熙、乾隆、嘉庆三朝三次纂修,每一次纂修,都是先令全国各地修地方志,这样就促进了地方志的大发展。清代各级地方行政单位都普遍的修了地方志。省有《通志》、府有《府志》,直隶州、直隶厅(州、厅小于府、直隶于省)以及县、市、镇均有志。此外,还有专记山水、古迹、寺观的志书。自宋、元、明以来,县是地方的基本行政单位,因而《县志》的数量特多。

从一统志到县志,其内容的项目虽然有多有少,实质上并没有什么差异。这是它们相同的方面,并且是主要的方面。但是从实际功用来看,一统志和县志又有不同的方面。这就是:一统志的选材不但更形式化,其内容也因受皇族地主的偏见所影响更加封建化了。因此,许多具有地方色彩和反映居民生活的重要材料都被抛弃了。地方志诚然是为地方的封建豪强势力服务的,但较好的地方志一般是包括了本地区自古以来的遗文逸事,也吸收了其他志书中有关本地的材料,更重要的是它采纳了本地居民生活和天然资源等现实材料,所以比一统志的内容更丰富,有的也比较接近真实。

二、清乾嘉时期编修方志的方法

乾嘉时期编修方志的方法有三派。

(1) 章学诚派:章学诚是一位大史学家。他也修了几种县志。他根据自己的实践总结了前人撰作方志的成败、得

失、建立了方志学。《文史通义》的《方志立三书议》、《州县请立志科议》和《修志十议》等篇集中地表达出他对修方志的见解：

甲、方志是地方史：他的这个观点远比前人明确，因此，讲究“文质”，反对华而不实。他认为方志只考虑地理沿革不及其他，是一种“偏而不全”的倾向。他主张方志应该给国史提供基本资料，并且是它的组成部分，“分者极其详，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而且方志具有“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的便利条件，可以掌握便利条件，可以掌握现实种种情况，平时积累了丰富翔实的资料，修方志时就能“博观约取”，所以他说，“夫志者，非示美观，将求其实用也”。方志为了“实用”，这是他的史论的可贵之点。

乙、方志包括志、掌故、文征：他根据方志即地方史的论点，论述了方志的体例和内容。他说，“方志必须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所谓“志”指地方行政制度；“掌故”指地方行政文件；“文征”指本地人和外地人描述该地生活的诗文。三者构成方志的内容。他认为上述材料必须经过核实才能被采用，他尤其重视人物的取舍，他主张列入方志的人物，必须是对地方做了好事的。材料也要实际、具体，反对弄虚作假。至于一些不合乎上述体例而又弃之可惜的材料，他提出收入“余编”，以免失散。

丙、设立专门机构——志科：既然方志包括如此丰富的内容，如果不经常积累有关资料，就不可能把方志修成。因此，他建议立志科（职权与地方的吏、户、礼、刑、工等科

相同），专门搜集和保管方志的材料。凡是当地发生的较重要的事情，如各科的文件及有关修桥补路、讲学等资料，都要给志科送付本。并且建立“藏室”，“水火不得相侵”，加以妥善严密保管。另外，在四乡各遴选一个士绅随时将搜求到的遗文逸献和现实材料呈报志科。他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修好方志。

（2）考据学派：嘉乾时期有一部分汉学家在充当地方官吏以后，都提倡修方志。也有的为了衣食被地方官吏聘请去修方志的。他们把自己在学术上的“崇古薄今”思想作风也带到方志的领域。汉学家毕源做过两湖、河南、陕西等地方的督抚，他自己领导过《西安府志》和《关中胜迹图记》的编辑，同时又招集了一批汉学家专门替这些地方修方志。戴东原、孙星衍都在这一影响下修过一些方志。这一派修方志的方法与章学诚刚好相反。他们对旧材料十分重视而轻视现实材料，经常用正史中有关资料作为修方志的凭借，反而把反映现实生活的实际资料排斥不用。章学诚在《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一文中便叙述了他同戴东原关于修方志的一次争论，反映出两派方法论的交锋。戴东原主张“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这就是说方志即地理沿革的考证。而考证的基本材料则来源于旧史。章学诚对这种观点、方法作了有力的批驳。他说：方志固然要考证地理沿革，但主要侧重于遗文逸事的搜集，“补正史所不足”。“如前人无憾”，则他当续新有，前人有阙，则当补其所以无。并且按照“详近略远”的原则安排材料，修的方志才有实际功用。戴东原的论调体现了这一派的共同倾向。他们在这种观点、方法支配下修成的方志，实用价值是很低的。

(3) 地方封建集团编纂的方志：所谓封建集团，是指地方上官吏同士绅、地主相勾结的集团。现存的地方志，最大多数是由这类人编纂的。这个地方封建集团编纂方志没有一定的“成法”，通常是修志局由官方设立、士绅参与其事，并委派当地秀才、举人、进士之流到处采集有关资料。由于他们的出身阶层和思想意识有某些差别，对修志做法和态度也就不尽相同，因而修纂的方志也良莠不齐。有相当数量的方志，反映的现实生活面也较真实，较广泛，对于今天的实用价值就大一些。

上述三派在编纂方志的方法上虽然各有不同，但他们的基本立场都未超出地主阶级利益的允许范围。如对人物的取反映出这一点。章学诚提倡忠、孝、节、烈，戴东原首推“名僧”，而地方封建集团侧重于表彰自己的作为和家世。

三、旧方志的作用

旧方志的材料有些来自现实生活，这就在客观上保存了一部分地方情况的真实性，因此，它的内容不仅比正史的地理志或一统志更为丰富，而且在歪曲现实的程度上，也比受王朝严密监督所编修的正史一统志小得多。这样，地方志所保存的材料在今天就有多方面的作用。

(1) 有关农民革命的史料：旧方志都或详或略地把当地农民革命的活动情况当作反面材料记载下来，尤其近代的地方志对于近百年来大大小小的农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事迹有较多的记载，可供利用的价值也较大。如